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6)

主编：徐以骅  
章 远  
朱晓黎



当代传教运动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六辑

时事出版社

# 宗教与美国社会

——当代传教运动

(第六辑)

主编 徐以骅 章 远 朱晓黎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 第 6 辑/徐以骅、章远、  
朱晓黎主编.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232-315-5

I. 宗… II. ①徐…②章…③朱… III. 宗教—研究—美国  
IV. B92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056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 子 邮 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5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 ◆ 国际视野、当代关怀
  - 传教运动与国际关系(代序) ..... 徐以骅 ( 1 )
- ◆ 当代基督教传教运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涂怡超 ( 16 )
- ◆ 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
  - ..... (美)达纳·L. 罗伯特(Dana L. Robert)著  
徐以骅译 ( 54 )
- ◆ 人道援助与信仰救赎
  - 浅析基督教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传教功能 ..... 朱晓黎 ( 77 )
- ◆ 当代英国宣教状况概览 ..... 孙艳燕 ( 99 )
- ◆ 另一类文化革命?
  - 作为基督宗教第三支重要力量的五旬节派 ..... 戴维·马丁(David Martin)著  
徐以骅译 (142)

- ◆ 若望·保禄二世与当代天主教传教
  - 运动 ..... 郝平 (164)
- ◆ 慈幼会及其相关国际组织对当代世界的影响
  - ..... 孔陈焱 (183)
- ◆ “华福”与新传教运动 ..... 张永广 (199)
- ◆ 塔布赖格·贾马特概述
  - 当代伊斯兰教传教组织个案研究 ..... 刘军 (227)
- ◆ 福音派及其国际参与
  - ..... 艾伦·D. 赫茨克(Allen D. Hertzke)著  
涂怡超译 (245)
- ◆ 试析暴力冲突格局下宗教活动场所的聚合功能性行为
  - 以科索沃德卡尼修道院为例 ..... 章远 (281)
- ◆ 制服与动员
  - 以佛教慈济基金会为研究对象 ..... 黄平 (316)
- ◆ 构建宗教影响国家安全的分析新框架
  - 基于对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批判  
思考 ..... 刘骞 (345)
- ◆ “国际支援西藏网络”解析 ..... 刘倩洁 (378)
- ◆ 宗教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 约翰·F. 威尔逊(John F. Wilson)著  
徐以骅译 (397)
- ◆ 作者简介 ..... (466)

# 国际视野、当代关怀

## ——传教运动与国际关系（代序）

• 徐以骅

2008年8月6—7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美国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传教运动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在该次会议上，针对国内各宗教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本人提出了实现以下“四大跨越”的研究设想供与会者讨论：

首先是实现从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历史到传教运动现状的“旧与新”之间的跨越。就国内学界而言，对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研究重历史轻现状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且两者基本上处于割裂状况，因此国内的传教史研究往往缺乏对现状的关照，尽管目前国内宗教学者如卓新平教授对当代基督宗教的发展已有较

为系统的研究。<sup>①</sup>

从全球范围来看，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宗教复兴造成了基督教传教运动从全球处境、运动方向到传教战略等方面具有颠覆性的变化。<sup>②</sup> 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一举摆脱二次大战以来的颓势，迎来了继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说“伟大世纪”（19世纪）后的所谓的“更伟大世纪”或“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在基督徒人口分布上发生了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转移，在差会背景上发生了从传统/老线差会向福音/新兴差会的方向性转移，在传教领导权上发生了从外国差会到本地独立差会的战略性转移。<sup>③</sup> 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sup>④</sup> 更多是生活在社会边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而不

---

① 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卓新平所著《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该书2007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以及《“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该书200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另可参见涂怡超：《现代福音派国际网络的形成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上），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63页。

② 从宣教学观点看待当代传教运动发展趋势的著作可参见 Michael Pocock, Cailkyn Van Rheenen and Douglas McConnell, *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Missions: Enga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5) .

③ 可参见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史述评》，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350页。

④ 引自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是来自全球北方富庶国家的中产和富裕阶层；而 21 世纪初一位典型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已非男性白人，而更可能是女性或其他种族。<sup>①</sup> “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移民教会”、“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的新面孔”和“世界宣教大变脸”的基本内容，<sup>②</sup> 作为传教中心“波士顿和纳什维尔正在让位于汉城（现称首尔）和内罗毕”<sup>③</sup>。事实上，就所派遣的海外基督教传教士的人数而言，韩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

<sup>①</sup> 其中女性传教士的增长率要远高于男性传教士的增长率，可参见本辑涂怡超：《当代基督教传教运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sup>②</sup> 可参见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中译本；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见上引 *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Missions: Enga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 (Robert Wuthnow) 教授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所有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提供传教人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上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引自作者在 2008 年 2 月间所做伍斯诺教授演讲记录。

<sup>③</sup> Dana L. Robert,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Oct. 1994), mhtml: file//C: \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Local%20Settings\Tempor... (June 9, 2007), p. 10.

第二大国。<sup>①</sup>

20世纪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大变局还包括五旬节派的崛起。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支力量，在世界范围促进了基督教根基跨文化转移的“文化革命”，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在2亿以上。五旬节派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所有地区都获得了规模空前的增长，如在拉美，新教各宗派尤其是五旬节派的增长正在挑战拉美社会天主教会认同的长达五个世纪的历史。<sup>②</sup> 照本辑作者之一的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旬节派的崛起甚至“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始”。<sup>③</sup> 当然也有学者对“未加思考地使用‘五旬节派’称呼来概括正在增长的世界基督教”这种做法持有异议。<sup>④</sup>

---

① 韩国世界宣教协商会（KWMA）称，截至2007年年底，韩国560个教会团体派遣的1.6616万基督教传教士到世界173个国家和地区宣教，规模仅次于美国。而就基督教徒的宣教热情、志愿和牺牲精神而言，韩国堪称世界第一。引自苏恩仙：《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危机为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第10页。

② 关于五旬节派在拉美尤其在南美和中美洲的发展，可参见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s 9 and 10.

③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2008年，未正式发表，第5页。

④ 《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223—224页。

也许目前断言 20 世纪是白人主导基督宗教的最后一个世纪还为时尚早，但上述基督教新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新局面确实颠覆了关于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的性质、趋势及其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具体而言就是天主教会重心从欧洲向拉丁美洲的转移及基督教会重心从美洲、欧洲向非洲、亚洲的转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sup>①</sup> 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发展。如果说，昔日“每位帝国赌博的新玩家都谋求以传教活动的辞令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sup>②</sup> 那么今天的西方政治和宗教势力则通过“宗教自由”和“宗教人权”议题来介入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教会史取代宣教史，研究世界宣教取代研究海外宣教，新宣教学取代老宣教学而成为学术研究主流，基督教传教运动已由宗派性差传让位于普世合一性差传再过渡到对差传的超越，从过去单一性解释过渡到现在的去中心和多元化的解释。<sup>③</sup> 抱残守缺地坚持传统的“中心一边缘”、“差会一工场”、“西教东渐”、“基督教扩张史”、“被传教受支配”的研究范式，不仅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传教运动的现实

<sup>①</sup> 《向南移动：1945 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 221 页。

<sup>②</sup>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p. 35.

<sup>③</sup> 可参上引 Dana L. Robert,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处境，也无法充分解释传教运动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中国基督教史而言，中国教会固然不能因“控诉运动”等的“彻底清算”而成为“无根”的教会，<sup>①</sup>也不能因缺乏对当代全球基督教布局和传教运动发展趋势的关照而成为“例外”的教会。

其次是实现传教运动与国际关系“圣与俗”之间的跨越。<sup>②</sup> 美国著名宣教史学者比弗（R. Pierce Beaver）曾这样评论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很久，海外宣教仍然是“美国花费最大且最为持续的对其他民族的善心和利他主义的表示，是美国文化在草根层面对这些民族产生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此后它继续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sup>③</sup>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基督宗教重心南移论”的主要学者达纳·L. 罗伯特（Dana L. Robert）亦指出：“差传事业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在于国际关系领域。”<sup>④</sup> 然而，除了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史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等少

① “无根”的说法参照邢福增教授《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的《自序》，该书 2008 年由香港道风书社出版。

② 此处跨越“圣与俗”的说法参照 Andrew Prest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5 (November 2006) .

③ R. Pierce Beaver, “Missionary Motivation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in J. C. Brauer, ed., *Reinterpretation in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vol.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 113. 另参见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时事出版社，2004 年版，第 99—100 页。

④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p. 11.

数领域外,<sup>①</sup> 即使在西方学界, 对传教运动与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仍似“两股道上跑的车”, 极少有交集与会合, 尽管宣教学/宗教学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分别都是中西学界得到最多关注的一些研究领域。<sup>②</sup>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宗教全球复兴正在改变上述“圣与俗”研究分离的状况。各大宗教的全球性扩张及其所引起国际社会的大规模“认同变迁”和冲突碰撞, 正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传教运动研究也开始走出宣教学和教会史的“隔都”, 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所谓主流学术领域的学者展开越来越频繁的对话。鉴于传教运动对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 本辑作者之一涂怡超博士把基督教传教运动称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革命引信”和“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重要因素, 认为传教运动在使宗教问题国际化、造成基督教会与民族国家和其他不同宗教/民族之间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对抗等方面有直接作用, 并且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因素。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和宗教学教授、《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作者詹金斯(Philip Jenkins)所言, 传教和宗教移民运动不仅引起了全球宗教的大变局, 而且还可

<sup>①</sup> 可参见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王立新:《美国在华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一个初步的阐释框架》, 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社会》(第二辑), 时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99—320页。翻译著作有李本京主编:《美国基督教会对中国之影响》, 台北:正中书局, 1991年版等。

<sup>②</sup> 关于国内外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趋势与研究》, 此为提交2009年10月20至21日在澳门召开的“科学、宗教与发展论坛”会议论文。

能造成全球政治的大变局。他指出目前在全世界 25 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至少有 10 个出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严重对立的状况，因此这些国家均有可能成为“严重宗教冲突的舞台”。<sup>①</sup> 当前全球基督教传教重点即多半为“福音未及之地”和“未得之民”的所谓北纬 10 至 40 度之窗，<sup>②</sup> 或“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sup>③</sup> 所覆盖的从东亚/东南亚经中东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就与从北非、中东到南亚的所谓伊斯兰弧形地带或极端主义弧形地带多有交叉重叠，成为宗教冲突的高危地区。此外，基督教传教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对传教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④</sup> 2007 年“阿富汗人质危机”引起韩国社会与教会以及教会内部的对立冲突就是例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宗教行为体一样，世界性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基督宗教在华的各种差会和华人宣教会，并未因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完全销声匿迹，而是大部撤至港台、东南亚甚

① *The Next Christendom*, pp. 166-167.

② 关于北纬 10 至 40 度之窗，可参见 Window International Network 网站：<http://www.win1040.com/>。

③ 可参见 Kim-Kwong Chan, “Mission Movement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to be published (2009).

④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Daniel H. Bays and Grant Wacker, eds., *The Foreign Missionary Enterprise at Home: Explorations in North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Tuscaloos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

至更远的地区，这便大大拓宽了“对华宣教”和“在华宣教”的范围，使之成为在一次与二次大战期间基督教传教运动国际化的后续发展。<sup>①</sup> 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乃是旨在“传道于天下”(evangelizing the world) 的国际传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对受派遣差会调度而事奉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来说，在华宣教并不一定就是其传教生涯的起点或终点。因此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不仅需要沟通“对华宣教”与“对中国文化圈宣教”，而且需要串联“对华宣教”与“普世宣教”，使其具有更宽阔的视野，事实上，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对华宣教”的后续发展，如对在华差会和传教士撤离中国及反思经验教训的研究，<sup>③</sup> 但对在华差会和华人教会 1949 年后在海外的跨地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演化和发展，以及对同一时期在华宣教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宣教的比较研究，学界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sup>④</sup> 因此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当代化和

<sup>①</sup> 关于一次大战与二次大战间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或第一波全球化，可参见 Dana L. Robert,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April 2002), pp. 50-64.

<sup>②</sup> 可参见 Terrill E. Lautz, “The SV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in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19;

<sup>③</sup> 可参上引《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第四章。

<sup>④</sup> 裴士单 (Daniel H. Bays) 和魏爱莲 (Ellen Widmer) 在他们主编的上述关于在华教会大学史的新著中，就加入了同时期关于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和土耳其的个案研究，并指明比较中外传教事业的研究方向。见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pp. 267-269.

国际化具有较大的空间，尤其在备受海外宗教媒体关注的华人“回宣”领域。本辑收入张广永博士的《“华福”与新传教运动》一文就是关于当代华人教会海外传教活动的个案研究。

第三是实现基督教传教运动与其他宗教传教运动“教与教”之间的跨越。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兴和持续发展，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到本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宗教获得了比基督宗教更快的发展以及比基督教新教任何一个宗派更广的分布。<sup>①</sup> 在欧洲，伊斯兰教和佛教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继基督教或天主教后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取得了与这些宗教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存在和发展相称的地位。在中国和整个华语世界，尽管基督教在 19 世纪首先开创了大规模慈善活动的先例，但正如波士顿大学魏乐博（Robert Weller）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却是佛教在开展慈善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sup>②</sup>

<sup>①</sup> 如伊斯兰教分布于全世界 204 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教分布于 218 个国家和地区、犹太教分布于 134 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分布于 126 个国家和地区等。David Barrett, George T. Kurian, and Todd Johnson, eds.,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2<sup>nd</sup> ed.,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②</sup> 可参见魏乐博（Robert Weller）著、汪昱廷译：《中国社会的宗教和公益》，提交“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 2009 年 7 月）论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一般关注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尤其是其在华历史，在该领域尤其在基督教高等教育史等方面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研究的中国化”<sup>①</sup> 或已进入“学术进展主要发生在中国的第三阶段”，<sup>②</sup> 相比之下，因各种原因国内学者对其他宗教传教运动的研究就相当有限，<sup>③</sup> 对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巴哈伊教、印度教等东方主导宗教的

<sup>①</sup> Jessie G. Lutz,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in Peter Chen-main Wang, ed.,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 2007), pp. 119–149. 在该文中鲁珍晞教授指出，在华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主要可分以下四个阶段，即（1）宣教史，1925年—50年代；（2）挑战和反应的历史，1960年至70年代；（3）以中国历史处境来考察教会大学，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及（4）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80年代以来。鲁珍晞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第四阶段，教会大学的研究正在更迅速地实现西方学者向中国学者交棒。

<sup>②</sup> 裴士单和魏爱莲教授在上引书中指出，在华教会大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成果分别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出面组织的关于在华教会大学“有怀旧色调”的颂扬性系列著作的出版，以及20世纪70年代鲁珍晞教授的《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以及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教授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这两部开创性著作的问世。第三阶段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见“Preface: This Volume in the Context of Evolv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in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pp. 303–307.

<sup>③</sup> 此类著作有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安娜·塞德尔著、刘凌译：《西方道教研究史》第八章《中国之外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北上”的研究有待深入，而对“海纳百教”、“无拘无束”、“多元多源”且曾经或正在风靡西方社会的各种新兴宗教/信仰运动如新时代运动<sup>①</sup>也缺少探讨，传教史实际上几乎成了基督教传播史的另一名称。世界上各种宗教都具有自身特点的传教方式和路线，而宗教传播引起的各宗教间的包括相互借鉴和碰撞的互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此外，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传教（或称福传、拓展、拓荒、外展、弘法、弘道、度人等）运动既不依附国家也不借助国力，其中许多宗教在所在国还处于少数派宗教甚至受压迫宗教的地位，并且与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主义均无瓜葛，这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尤为如此。

第四是实现网络传教与传统传教“虚与实”之间的跨越。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以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或称“电脑宗教”、“虚拟宗教”）<sup>②</sup>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网络对各种宗教的传播都有“放大效应”，大大提高了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

<sup>①</sup> 关于新时代运动可参见潘天舒：《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美国“新时代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下），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589页；罗伟虹：《美国的新时代和新宗教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54页。

<sup>②</sup> 费利克斯·威尔弗雷德（Felix Wilfred）：《信息社会的宗教与神学》，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第83页。